

民族道德與

民族精神

民

德

民意徵文叢刊 第一集

【徵文題】 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

第一名..... 吳錫澤..... 1

第二名..... 吳坤淦..... 13

第三名..... 周明道..... 31

第四名..... 劉琦..... 48

第五名..... 臧渤鯨..... 57

J
266
13

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

一

吳錫澤

當這第二期抗戰開始的時候，蔣總裁曾以動員全國國民精神相號召，並引「總埋一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賴精神；兩者相較，精神力最居其九，物質力量僅佔其一」語以昭示全國；同時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綱目中，且列舉救國之道德以爲振衰起敝之資。而總理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更諄諄以恢復民族道德勸勵國人。於此可見一個民族的精神和它的道德，是有密切而不可分離的關係的。究竟這兩者的關係是怎樣，及其對於民族盛衰的影響如何，本文擬就下列四點加以說明。

民族道德是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現

何謂精神？精神到底是什麼東西？在科學上——特別是在心理學上講起來，精神就是行爲、思想、情緒、態度等心理現象的總稱；而思想情緒態度等又概可視之爲行爲，故我們也可以說精神就是行爲。

行爲之合於一定的法則的則謂之道德。康德 (Immanuel Kant) 說：「所謂道德，就是依從實踐理性所命的法則」。而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則把道德看作理性活動的習慣，謂理性在止富指導情感時，生出無過不及的中庸習慣，即是道德。所以道德是中庸，是習慣。我們如果說得通俗些，精神與道德實在可以說是一件事物的兩方面——蘊於內的，則謂之精神；發於外的，則謂之道德。簡言之，即道德是精神的最高表現。

每一民族，每一國家，乃至每一宗教團體，都各有其永存不變的道德標準，這個道德標準，就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或這個宗教團體精神的最高表現。「國於天地，必有以立」，所謂「有以立」者，即立國的根本精神是。其立國的根本精神如何，則概可於其相承不絕的道德標準中求之。譬如「武士道」是我們的敵人——日本的立國精神，同時也就是大和民族所奉行的道德標準。故日本是專以侵略他人爲職志的。又如基督教所確定的道德標準爲：

- (一) 愛——愛恤隣人，同情於不幸者，故對敵人也接以溫情。
- (二) 信——對神的信和對同胞的愛，是同一原理的兩方面。
- (三) 服從——人若打你右頰，你再與以左頰。
- (四) 謙遜——你們當中要想爲最大者，就是爲一切人的僕人。
- (五) 節操——見婦女而起色情者，是心中已犯姦淫了。

後基督教復興精神在博愛、救人、濟世。

至於我們自己民族的道德標準，就是中山先生所耳提面命亟須恢復的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個德目，是我們全國人民行爲的法則，也就是我們數千年來相承不絕的立國精神。所以，我們的民族精神是愛好和平的，是最講究人與人間及國與國間的信義的，是泛愛衆而親仁的，是忠於國家孝於民族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這民族精神發揚光大之，使之一一從實際行爲上表顯出來。換言之，即要求全國人民的一切行爲，純受這八個德目的原則支配，所發出來的行爲，統統要能夠符合於這八個德目的原則；而最要緊的就是一切行爲並且是爲了這八個德目的原則而發出的。要這樣，才能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二 民族精神的渙散是由於民族道德的墮落

民族精神既然是從民族道德上表現出來的，無疑的，如果一旦民族道德墮落，勢必至於使民族精神歸於渙散的。但我爲什麼不說民族道德的墮落是由於民族精神的渙散，而說民族精神的渙散是由於民族道德的墮落呢？會不會顛倒了這裏面的因果關係？我的回答是很肯定的：不會。因爲民族精神是抽象的，看不見的。我在上面曾經說過，所謂精神，不過是行爲、思想、情緒、態度等心理現象的總稱而已。所以，必使全國人民的行爲都能合於一定的法則——都能合於這八個德目的標準，纔有民族精神之

可言。否則，民族精神勢將不能存在，豈獨渙散而已。

在這次神聖抗戰的過程中，所最令我們痛心疾首的，就是所謂漢奸。漢奸問題，確是目前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假如不是我們有這許多不肖的同胞甘心去「爲虎作倀」，儘管敵人的武器怎樣厲害，他軍事上的進展絕對不能有過去那樣的順利的。敵人每到一個地方，就有許多大小漢奸去替他維持那個地方的秩序，使敵人減少後顧之憂，這是敵人所最自鳴得意的「以華制華」政策獲得相當的效果，而我們有這樣認賊作父的同胞，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而且漢奸當中，儘有不少受過新式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他們不是不知，而是明知故犯，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到底是什麼原因？直截了當的說，除了一部份民衆無知受欺之外，都是因爲他們沒有意志，沒有氣節，一經脅迫，一經誘惑，或且不經脅迫，不經誘惑，只要有官做，有錢拿，就什麼事都願意幹了。國民道德墮落，氣節淪喪到如此地步，民族精神怎不因之而渙散呢。所以，動員全國國民精神，確是目前急切不容或緩之圖。而提高民族道德則尤爲當前的急務。曾文正公有言：「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世滔滔，求一撻利不先，赴義恐後之人而不可得，是爲可懼」。的確，我們且不問敵人兇狠到怎樣程度，且先問自己能不能站得住。「物必先腐，而後蠹生」，世界上決然沒有一個道德高尚精神鞏固的民族而會爲人家所消滅的。

三 歷史上民族精神最消沉的時候，必是民族道德最墮落的時候——兩者對峙
民族盛衰的影響。

我們試揭開一部二十四史來看，把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盛衰史跡細細的尋繹一下，便可發現這麼一個歷史的定律：每當民族強盛的時候，其民族精神必極發揚，而民族道德必極高超的；反之，則民族精神必極消沉，而民族道德亦必極其墮落的。於此可見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對於民族盛衰影響之大了。

西漢末年，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習俗澆漓士風不振的時代，師儒雖盛，而大多不明大義，我們只要一看當時對於王莽頌德獻符×人那末多，就可想而知了。王莽傳稱：「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而一般號稱「清明之士」亦多屈膝事莽，不顧名節。

「自成帝至王莽時，清明之士，瑯琊有紀遂、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遂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賞重，歷公卿位」。

(漢書鮑宣傳)

知識份子的如此無恥，國家禮法的如此敗壞，民族道德的如此汨沒，無怪乎盜賊蠡起，天下大亂，遂使王莽敢公然的篡取漢家天下了。

及光武中興，乃積極的「尊崇處士，側席幽人」，對於不仕二姓的人，如卓茂、謙立、李業等，

無不優賜旌顯，風氣始爲之一變。於是一般讀書人，競以名行相尚；而氣節之士，亦迭層出不窮，民族精神一時極爲煥發，顧亭林先生至謂：

「光武……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無非經明行修之士，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吾道批僻，朝綱日陵，國防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強權之臣，息其竊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頽，決而不潰，皆仁人君子心力爲之。」

（日知錄）

降及晉代，崇尚清談，一般士大夫以「任情適性」「放浪形骸」爲清高，整個社會變爲頹廢，放逸、萎靡、驕奢、寡廉、鮮恥。漢世氣節之風，至此遂蕩然而盡。自從永嘉亂後，晉室偏安江左，清談的風氣，且變本加厲；政治社會各方面都腐敗到了極點。干寶在晉紀總論裏有一段評論，最說得鞭辟入裏；節錄於此，以見當時的社會是怎樣的一個社會。

「朝鮮純德之士，鄉之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蕩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義以虛談之名，劉訟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

(一) 民族道與國民精神

其噴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

道德如此淪喪，士風如此不裁，於是五胡異族，遂得乘機侵入中原，大肆猖獗。漢族之被殺戮者不下數十萬人，其被驅掠轉徙者更不可勝計。石虎符生等，殺人尤極慘酷無復人理，這是多麼大的一筆血賬啊！至是中國之文化，頓呈中落，中華民族幾爲之一蹶不振。當時的民族道德墮落到怎樣地步？且隨便徵引一個故事來看看：

「齊朝有一大夫，嘗語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好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

(顏氏家訓)

堂堂士大夫，竟無半點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反視「訓練漢好」，「培植奴才」爲要事。如此恬不知恥，民族精神怎不消失殆盡。

其實當時晉室雖偏安江左，兵力較弱；然如能發奮圖強，亦未嘗不可規復中原，遷都故土。你看桓溫在建康十年，帥師北伐，自江陵出襄陽，以趨長安，大破苻生，進軍至壘上，直搗咸陽。十二年，溫又自江陵北伐，敗姚襄於伊水，克復洛陽，軍事上是多麼的順利！但及溫倡議遷都洛陽，却爲孫綽等一班頑固大臣所阻撓，雖以桓溫的崇論宏議，終不能振起南朝葦荻衰頹的風氣。南北局勢，於是遂定。我們今日讀史至此，猶感覺到無限的可惜。且自淝水戰後，盤踞在北方的夷狄，一時分崩離析，亦大可一舉而盡驅之於塞外。劉裕於義熙五年北伐，滅燕破秦，克復洛陽，克復長安，胡虜喪胆，江左聲威大振。

民亦竟不趁此百戰餘威，驅除異族，盡復故土；而四有洛陽，竟又得而復失，坐視鮮卑族強大，統一北方。漢族自甘偏安，苟延殘喘；民族思想的消沉，可以想見，大好河山怎不爲外族蹂躪殆遍呢。及至梁朝，雖然也有過一次「功伴淝水」的「鍾離之勝」，雖然也曾一度克復過洛陽；然而中畿的淪喪，南朝士人早就置諸度外了。

「張駿傷中原之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譎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爲誰氏之士，而自賽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拓拔氏封劉景爲宋王，蕭贊爲齊王，以爲宋齊之主，使自爭也。梁亦以元顛爲魏王，而使之爭。拓拔氏遣將出兵，助劉景肅實寅以南侵，梁亦使陳慶之奉元顛而北伐，相襲也，相報也。以洛陽爲拓拔氏固有之洛陽，惟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有也。梁之喪心失志，一至此哉！……君忘其爲中國之君，臣忘其爲中國之臣，割棄山河，恬事異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中國之主如寇賊，而戴異族爲君父乎？至於此，而江左之不足自立決矣，幸宇文高氏之互相吞噬而不暇南圖也；不然，豈待隋之橫江以濟而始亡耶！」

（讀通鑑論卷九）

王夫之先生讀史至此，發爲議論，不禁感慨系之。

於是異族日益熾張，中原板蕩，胡騎所至，廬舍爲墟。漢族經過這次的大屠殺，元氣大傷；推原禍始，無非因爲民族道德墮落，以致民族思想消沉的緣故。直到唐初，統一全國，敦修名節，激勵士氣，

大漢聲威，始爲之復振。但到了五代，道德的觀念，又漸喪失，知識階級，不復以名節相尙。你看當時鼎鼎大名的馮道，歷事唐晉漢周四姓十三君，恬不爲怪；且自稱爲長樂老，以誇耀其歷朝所受的榮寵，真是無恥之尤。

「馮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時始顯著。自是累朝不離宰相公卿之位。……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傳，自敘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稱之」。

(五代史)

五代史馮道傳論，說得最沉痛：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當時尙有卜耆契丹自稱爲兒皇帝的石敬瑭，也足與長樂遙相輝映。民族志節喪失盡矣，無怪漢族至是又復遭受外族的侵凌了。

到了南宋，外患益烈，民族道德，愈益墮落。漢奸國賊，真是多如牛毛。有志節的人，只有岳飛、韓世忠、胡銓等少數幾個人。當時外有「爲虎作倀」的大漢奸劉豫，內有「遇敵主和」的大國賊秦檜。弄得國事日非，寇勢益張。而宋室則苟延殘喘於江左，不復以光復故土爲職志。張溥在宋史紀事本末中

論得最中肯：「自是二十餘年，國家亡疆敵之患，而媿宴安之樂。檢亦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濟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

江左小朝廷，苟延至度宗以後，道德觀念，更形衰落，禮法綱紀，亦廢置無人顧問。我們且看其時身負國家重任的賈似道，當國事如此危殆的時候，還是「日坐其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取官女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輿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竊其第者」（見宋史紀事本末）。且常與妻妾坐地鬥蟋蟀，所以其所狎客有戲之曰：「此軍國軍事耶！」

國家的大臣，竟糊塗到如此地步，腦筋裏那裏還會有民族思想的存在。所以蒙古兵未至，而宋朝早已形存神亡了。蘇子瞻說得好：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富與貧」。

明朝的亡國，也是如此。當時李自成寇北京，形勢已非常緊急，崇禎皇帝遍召朝臣，竟無一人敢至，民族精神的消亡，於此可見。柳詒徵先生在所著中國文化史裏，論得最確切：

「朱明之亡，亡於流賊及清，此盡人所知也。然流賊滿清之所以能亡明者，實由於明室朝野上下之腐敗。不此之責，第歸咎於流賊及滿清，無當也。當明之中葉，士氣已壞，觀宗臣報劄一丈書，即可知其時士大夫之無恥，至其末造，腐敗益甚。官府壞於胥吏，地方壞於鄉紳，兵不教練而

(一) 民族精神與道德

肆搶劫，將無學術而務欺詐。貪鄙奢淫者相望於社會，而所謂清流名士者，亦惟甘樹黨相攻，各立門戶，至亡國而不已。此毫無文化之滿洲人所由乘其隙而入主中國也」。

在南宋末年和明朝末年，雖然也出了個文天祥和史可法，都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忠義之士，民族英雄。可是「垂垂大廈傾，一木支無力」，二公雖然志切報仇，決心恢復神州土地，其奈整個民族精神，已經消亡，僅靠一二人的奔走呼號，終無補於這兩個朝代的崩潰了。

四 欲發揚民族精神須先提高民族道德

歷史告訴我們，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對於民族盛衰的影響既是如此之大，由此可見 總裁所說的「精神勝於物質」的話，是有歷史上的根據，是信而有徵的了。但我在上面曾說過，民族道德是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現；而民族精神的渙散，是由於民族道德的墮落；所以我們如果發揚民族精神，須先提高民族道德，這就是我的結論。

總裁在建國運動一文中曾說：「建國的原動力沒有別的，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德，而尤以仁愛為中心。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相傳的道德，深入於一般人心，幾乎成了每一個黃帝子孫的天性，只要把它恢復過來，就是建國的總動力所在」。建國的總動力所在，實在也可說就是民族精神的所在。 總理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曾反覆闡述，要恢復民族地位，須

先恢復民族精神；而欲恢復民族精神，除了能知與合羣之外，最要緊的便是恢復民族道德。故恢復民族道德，可以說就是恢復民族精神的先決條件。換言之，也就是欲發揚民族精神，必先提高民族道德。因為我們現在對於民族道德，不僅是要恢復，而且要加以提高；同樣，對於民族精神也不僅是要恢復，而且要從而發揚光大之。民族精神是立國的要素，是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所不可缺少的要件。總裁之所以要提倡新生活運動，其目的亦即在於恢復我們民族固有德性，改變習慣，風動社會，以振作積極的精神」（見建國三要素）。

菲希特（Fichte）當拿破崙的軍隊蹂躪全歐洲的時候，曾沉痛的向國人演說：「德意志人民，在武力抗戰，雖已失敗；在品性戰爭，應再接再厲」。菲氏所提倡的「品性戰爭」，就是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族道德，用以發揚民族精神而達到抗戰建國的目的。我們深深的相信：一個志節高尚精神鞏固的民族，一時雖遭失敗，未有不終歸於強盛的，今日的德國，就是一個強有力的明證。

一 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之關係

吳坤淦

在這戎馬倥傯戰雲漫天的時代裏，中華民族已整個地奮發振醒過來了！幾千里長的戰線，幾千百處的烽火，幾千萬人的流血犧牲，形成了這次亙古未有的民族大血戰。戰爭的前途，將決定我們民族的燦爛復興，設或墮落沉淪，將永陷於悲慘痛苦的境地。因此，我們今天來檢討一下自己的民族，考究我們民族究竟是否優秀，他有些甚麼特殊的德性和精神，再從而如何發揮這些德性和精神在這次抗戰中，使勝利和復興能有較大的把握，實在是亟需的事。

要考究甚麼是民族的精神，便須先明瞭甚麼是民族的道德；而要明瞭民族的道德，更須先瞭解「民族」和「道德」的涵義。何謂民族？總理於民族主義第一講裏說：「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何謂王道呢？「自然力便是王道」。所謂自然力，總理又分析為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等五種力量，「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而得的」，用武力征服而得的乃是國家。所以民族的意義，是由於同一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五種自然力，而結合成的一種團體。至於道德的意義，周易說：「和順於道德」。禮記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疏：「道者通物

之名，德者得理之體」。道家始祖老子，在他的道德經裏說：「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說：「道生之，德畜之」。儒家先師孔子則說：「率性之謂道」，「行而有得之謂德」。由此可知我國人談道德，實遠始於上古，而且已能合宇宙觀和方法論以言了。綜合上面這許多先哲的說法，我們可以知道「道」是滋生萬物的本體，是指和順萬物的自然；「德」是得乎理法的個體，是指萬物各自所得之自然。「道」是先天的，神聖的，至善至美的；「德」是力行的，畜育的，因致而異的。如果「道德」二字連起來講，便是各個個體依了自然的律則而去追求本體。唯生論的創作者陳立夫先生把「道」解釋為「主義」，倒是很妙善的辦法，因為主義是民族國家的最高精神綱維，是神聖的、超越的、高潔的，所以和道、本體、範疇，實是在同一意義。由此我們更可以說道德是每一個人仰慕主義貫徹主義的行爲。民族的道德便是全民族的人民仰慕主義貫徹主義的行爲。仰慕熱烈，遵循合理，是善良的道德；信仰錯誤，行動乖張，是惡劣的道德。

道德和民族道德已經說清楚了，我們進而研究何謂「精神」和「民族的精神」。「精神」二字，初說於宋玉：「蓋徒以愛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莊子：「澡雪而精神」。左傳的所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這幾句話，是最精彩的了！精神，原來是人類活動的根本要素，是人的靈氣魂魄之具體表現；表現到最誠摯處，能夠感天地而泣鬼神，開金石而通神明！精神一死，哀莫大矣。民族的精神，是一個民族的魂魄精靈之表現，是使這個民族繼續生存

向上發展的原動力。一個民族如果精神萎靡，生氣毫無，則便趨於衰落沉淪；反之，如果精神亢爽，朝氣蓬勃，則此民族便蒸蒸日上，進於富強之境。朱熹說：「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實在是最好的註腳。

明白了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的意義，現在要進一步追問二者的關係怎樣了！大家都知道，歷史的發展是以民生為中心的：在初民時代，人類穴居野處，茹毛飲血，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其生活與禽獸無異，無所謂有道德，更無所謂有精神（註一）。後來燧木取火，熟食發明，結網種穀，民多耕稼，人與人的關係較前密切，各種風俗習慣也慢慢形成，於是產生了所謂「習俗道德」。再到後來人類的生活更趨進步，政治的組織漸漸嚴密，執政者知道把許多風俗習慣鑄成實際的法律，使人民行動有了明確的遵循，這便是「公民道德」的形成。在「習俗道德」之時期，民族的精神尚未誕生，直到「公民道德」之時期，民族精神纔慢慢抽芽滋長，跟着道德的發展而趨於堅定。更到後來，人民的生活愈複雜了，法律的限制已不適用，人們除了消極地不違背國家法律外，更要自動地建樹一種高尚的積極的道德。這種道德乃基於人類的理性，是人們深思熟慮而得的，於是人民的精神完全自動地表露出來，而道德學上最後的一個時期所謂「思考道德」也因之完成（註二）。所以我們可以說，民族的精神是蘊始於遠古，開展於中古，而完成（理論）發揚於現代。換句話說，在習俗道德的時代，是民族精神的胚胎期；在公民道德的時代，是民族精神的發展期；在思考道德的時代，是民族精神的光大期。民族精神初出於民族道

種，但是出生以後便伴着民族道德共同發展，漸漸豐大。翻觀中外歷史來看，任何國家都逃不出這個規律。所以自從封建政治發生以來，某個國家的道德愈良好，則其民族的精神也愈煥發；民族的精神愈煥發，則民族的道德也愈高尚。二者乃互為影響，互為益彰，如車輔之相依，實相需而相成。

二 中華民族之道德

中華民族，實在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優秀的一個民族！四千多年悠久輝煌的歷史，四百多兆勤懇誠實的人民，再佔住四千多萬方里廣大遼闊的土地，這樣一個繁榮龐大的民族，實在是世界的奇蹟！在他的內部，包含着漢滿蒙回藏五個大族，但這是現在的情形；若從歷史上上去探討，則中華民族有華夏、東夷、瀛、吳、百粵、東吳、肅慎、匈奴、突厥、氐、羌、西藏、苗、獠等十餘種成分，且每種之中，又有數族之別。我們民族的血液，可謂混雜繁複了！所以廖鳳林先生論中國通史，第一個特色即說是種族複雜（註三）。在優生學上，種族複雜血液混合是最有利的，是故中華民族^的子孫也就非常優秀。到了今天，因為外力的壓迫和二百多年政治教化的腐敗，民族的生命線却又漸漸下墜，道德墮落，民生不振，外侮頻仍，山河破碎！所以今日的事是如何恢復民族的勇氣，使中華民族重行欣欣向榮。總理說過：「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復起來」，故我們先來討論民族道德的問題。中華民族的道德，在往古的經書裏可以找到許多種的說法。禮記：「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

調、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十義)。左傳：「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六順)。管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大學：「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中庸：「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五達道三達德)。孟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倫)。雖然各說不同，但均有其相共之處，總理具卓識的眼光，把這些公準歸納爲「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這八德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共同道德，是我們祖先遺傳下來最珍貴最豐盛的遺產。我們如果要認識自己的民族，便不可不對此八德先有明確的瞭解：

第一、忠孝：忠孝是中國道德中最要根本的一部分。亞里斯多德說過：「人是政治的動物」。人類脫離不了社會而孤立，在先民部落組織中，已需要「忠」的條件了。因爲部落是人的集合，如果部落內的人都不忠不信，毫無誠意，則此團體如何再能發生力量呢？到了國家組織的時代，「忠」的道德更有急迫的需要：一個國家對內要維持社會的安甯，對外要抗禦敵國的侵略，便祇有靠全體人民的忠誠爲國，赤心効命。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忠勇貞節的事蹟是極多的：蘇武留胡十九年，嚼雪吞氈，貞亮仗節，這種堅苦卓絕的精神，終使匈奴心折。諸葛亮匡扶漢室，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出師伐魏，上表說：「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多麼沉痛而耿介！宋朝的岳飛

文天祥，更是精忠堅貞，彪炳千古。「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忠肝赤膽，可以照鑑天地！文天祥是在南宋末年的，他力抗蒙古人的侵略，奮勇抗戰，輾轉奔走，雖然那時國運十分惡劣，大勢已去，但他還是募兵勤王，力圖恢復。直到兵敗被執，死而後已！在他死之前，尚作了一首正氣歌以示不屈，死之後於衣帶內又發現八句贊曰：「孔子成仁，孟子取義，維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不愧！」這是何等的忠義，何等的精誠！明朝末年，我們可發現同樣的故事：史可法勇敢殉節，陳秀夫負帝蹈海，中原雖皆淪亡，閩粵島嶼中尚有志士樹起大明的纛旗！至於子餘遺老，或則投繯山林，或別奔命各地，或以文字寄其隱痛，或織會黨以圖復興。祇要一息尚存，總念念不忘於祖國故朝，而想替子孫千代留下一線生路！這種種忠烈的史蹟，就是中華民族的道德表現，是中華民族的靈魂精神！至於「孝」德，乃是中國數千年來家庭倫理的首與觀念，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人們要替社會國家做偉大的功業，便先得從近處平易處着手。近處平易處是什麼？便是齊家孝親！戴季陶先生研究 蔣委員長所以成功的原因，就在忠孝這一點上。戴先生說 蔣委員長是個至孝至忠的人，所以才成爲全國的領袖，成爲偉大的中華民族的英雄（註四）！孝道，在農業社會家族制度的中國國情之下，原是培養仁心維持秩序的基本綱維。總理昭示我們，「現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這種優美的完全的固有道徳，我們實在應該把他恢復起來！ 蔣委員長是最好的榜樣，我們大家來努力學效，盡忠盡孝，做一個天地間的完人！

第二、仁愛：仁愛的道德，是有着心理學上的基礎。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在心理學上講到人類的本能時，確有惻隱之心這一項的。極端的行為學派縱然否認本能，但「同情心」總不失爲重要「動機」之一。人類有了這種同情的本性動機，才相處於羣體中而不亂，才有救援將入於井的孺子之行爲！心理學上尚有一項本能是父母的性愛，由於這種本能而引起的情緒，便是慈愛。一隻母鴿保護她的雛子，是那麽溫存；一隻母猿，死了她的幼兒也甚至斷腸寸寸！我們人類，尤其是天生愛好和平的中國人，對於仁愛更能發揮盡致。歷史上堯舜之治，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仁民愛物而和萬邦，舜禹之世，舜干戚以格有苗；文王之治，興德教以化江漢。對於遠族外人，無不一視同仁，這是何等偉大仁的愛精神！在學理上，孔子談仁是最適詳的。論語不過是一部二萬多言的書，談仁竟有到五十八章，一百零五次！孔子的說仁並且因學生而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子張問仁，孔子又回答說是恭、寬、信、敏、惠。蔡元培先生著中國倫理學史，總括孔子所言之仁是「統攝諸德，完成人格的總稱」。這個結論是很適當的。至於愛的理論，總理昭告我們墨經中講得最詳細，「兼相愛則治」，確是王道政治的絕對真理。孟子雖譏墨子爲無父，但他自己也得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必如此才可運天下於掌上。戴季陶先生敘述總理革命的動機，有一段話說：「先生的思想，是愛中國人；先生的信仰，也是愛中國人；先生的力量，也是由愛中國而發生。和愛一個中國人的心，推廣起來，就是愛全亞洲的被壓迫民族；推到極處，就是愛一切人類。由愛

中國人的心，生出救中國的行爲」(註五)。所以總理死後，陵園前的牌坊上也寫着「博愛」二字。凡我國民，對於總理這種偉大的仁愛精神，應該深深記取，體驗效行。應該深深記取，體驗效行！

第三、信義：信義也是中國固有的良好道德，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人類結合成社會，自然需要共信互信的。曾子一日三省其身，第一是「爲人謀而不忠乎？」第二便是「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吾國古人尊重信用，由此可見了。至於「義」的正確解釋，中庸曰：「義者，宜也」。孟子曰：「義，人路也」。所以義乃是合宜的正當的行爲。祇要辨清什麼是合宜的正當的，便能見義而勇爲，捨生而取義。現在淪陷區域裏有許多貞節之士，不甘心附敵作奸，也就是大義所感的緣故。在歷史上，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大家傳爲美談。總理在民族主義裏講信義，還提及一段故事，說中國人營商訂貨，不必立合同，祇要記入帳簿便了事。這種負責的精神，便是中國人在社會上有信義之表現。「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贊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至於日本人，則「縱然立了合同」，也「常不履行」。島國小人，究竟校鄙醜陋！我們中國人講信義，尙不止於此，不止於私人間和社會間，即在國際上也尊重諾言的。我們從不賴債，從不違約以自損國格，在國際聯盟以及其他種種條約公法上，中華民國還是第一個負責任的國家！我們對於往昔被迫簽訂的許多苛刻條約，決不否認抵賴，我們祇是苦苦忍受，埋頭奮鬥以打出生路。到了今天，我們的確可以大聲向全世界說：中華民國是最神聖最有信義的國家！這種信義是中華大國數千年來

累積遺傳而得的，是謂道國家所不能夢想的！全國的同胞們，大家起來，揮這偉大的美德，使他永遠保留在地球之上，掃蕩日寇的妖氛，重光東亞的宇宙！

第四、和平：和平是我們民族道德的最高表現，幾千年來的中國人民已養成一種酷愛和平的天性。現在世界各國，都以帝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自榮，侵略他人，壓迫別國，以為如此才顯得自己的偉大。殊不知這乃是粗鄙的野蠻行爲！在未開化的蠻荒時代，人與禽獸無異，才有自相殘殺、自相兇殺的事，在文明時代裏，人類是需要和平仁愛的！如果今日還要兇殺侵略，鬥爭階級，那不管是何時代的倒車，自附於禽獸之列了！我們中國人民，受了四千多年文明教化的薰沐，愛好和平的德性較任何民族來得進步：論到個人，中國便首重謙讓；論到政治，中國人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是何等高尙的哲學！固然，在武備上我們也講求的，我們還要論兵法。但我們設武備寫的是防止別人的侵略。止戈爲武，殺以止殺，這是我們的武德。此次抗日戰爭，在發動以前我們是極端忍耐的，政府一再聲明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但實在是日寇太橫了，逼得我們起而武力抗戰。雖然，如今他自己懊悔也來不及了！日寇錯認了中華民族的氣質與人格，輕於挑釁嘗試，結果自陷於萬丈泥淖而不能拔救！但是我們抗戰的目的，還是在和平。蔣委員長說：「我們這一次抗戰，在本國是爲完成國民革命之目的，求得中國的獨立與自由平等。對國際就是要擁護正義，恢復條約的尊嚴，重建和平秩序」。所以抗戰勝利以後，中國決不躍進爲帝國主義，中國尙是講信修睦的！在偉

太聖潔的三民主義綱維之上，我們中華家是和平普愛的，我們的民族，將永遠是和平普愛的！

中華民族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已釋明如上了。或許有人會覺得這種理論太空洞，陳舊迂腐，故步自封，但是事實上這些道德是幾千年來文化思想的結晶，是亟應提倡光復的。大學之在新民，湯之盤銘日日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祇要我們打起精神來努力躬行，準可以從舊道德裏創造出嶄新的生命！

三 中華民族之精神

伴着民族道德而生長的，是民族的精神。上面說過，民族精神和民族道德是互相益彰，互相影響的。一個民族有了某種基本的道德以後，便產生某種的精神。我們看了上述諸種中華民族的道德，也不難知道中華民族的精神何在。茲依作者的分析，把我們民族的精神列為勇武、博大、勤奮、堅忍四端如下：

第一、勇武：這是中華民族第一種卓越的精神。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可見得古時候人民是怎樣的英勇尚武，敵愾同仇！在「忠孝」的道德標準之下，「勇武」的民族精神原是必需的。必須人人壯健奮發，才可使國家終安且強。昔人教民，文武並重。孔子提倡六藝，射御已居其二。社會一般看法，亦以「孔武有力」為丈夫，以「羊裘豹袖」為美飾。「業

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憐？……捐軀 殉難，視死忽如歸！這是多麼豪放慷慨的詩歌！歷史上，勇敢壯烈的事情更不勝枚舉。單就班超深入西域一事作例，已足長人志氣了。東漢末年許多青年常人的勇敢殉節，誓死不屈，也永遠留得人世間的榜樣。這次抗日戰爭中，前線將士奮命摧陣，浴血苦鬥，這種忠勇壯烈的精神，更如白虹貫日，浩氣常存！勇者不懼，中華民族原非暴力所能屈服的！其次，我們談到孝道與勇武，二者之間也有密切的關係：諺云，孝子出忠臣，凡是真能孝父母的人，亦必忠勇於國家的。禮記個人不獨親其親，孟子勉人老及人之老，我們除了孝敬自己的父母外，還要孝及列祖列宗和他人的父老以至於民族的祖先，如今我們民族祖先的廬墓被敵人摧毀，開國國父的陵園被敵人污侮，有了這樣奇重的恥辱而不去洗刷，乃是天大的不孝罪人！古人以臨陣無勇為非孝，實在是最好的觀念，在今日應該從提倡的。

第二、博大：隨着仁愛的道德而滋生的，是博大的精神。在文化史上，我們民族的學術思想是最博大豐富了！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蜂湧而起，有的說儒，有的談法，有的主張無為，有的提倡陰陽，甚至於功利主義悲觀哲學等各種學說，無不應有盡有。這一片光明流麗的學術雲天，西洋的學者看了也要發奇叫絕！後來雖然漢武帝排斥百家，把人民研究的範圍縮小，但到了唐朝，天生愛好文藝的太宗，提倡學術，尊重文化，對於外來佛景等教化文明也寬容並蓄，獎勵發揚，又蔚成燦爛幻日光焰萬丈的奇觀！直到現在，世界各國對於宗教之信仰，尚沒有像中國那樣自由寬裕的。我們民族的氣魄度量，

可謂博大雄厚了。在政治上，我們的理想是要世界大同。古之學者即以平天下爲目的，而以國治爲過程。試看歷代君王拓邊御夷，無不寬大懷柔，撫循慰薦。是故化育異族，任純自然，海陸奔湊，競來師法。中華大國之爲東亞宗主，實有其理所必然！在軍事方面，秦始皇統一六國，大拓邊疆，西臨洮而北沙漠，東南二處都達到大海！而萬里長城的興築，尤爲千古罕見的鉅大工程！祇可惜始皇帝只用霸權，不懂民權，故不久卽便覆亡。漢武帝與唐太宗的武功經略，也是龐大無比的。元朝的版圖，西極歐洲，東盡遼左，南逾海表，北越陰山，更造成了空前未有的雄偉帝國！吾人披讀歷史至此，恆浩嘆祖宗功業的光榮偉大！在教育方面，孔子開口便是大學之道，要人學做大人君子；孟子也勉人從其大體，存養浩然之氣；司馬遷網羅天下，「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何等偉大的治學精神！所以中華民族在各方面都是偉大的，我們做子孫的人，要發揮這種固有的偉大精神，來建設三民主義的大中國！

第三、勤奮：勤奮是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中華人民有了這種勤於奮發的能力，以是克服一切困難，生存滋長到二十世紀的現在。海禁開放以後，同胞紛紛赴外洋工作，他們在國外所表現的那種勤懇辛苦的精神，沒有一個國家不佩服的。在美國鐵路發展史上，中國華僑是永遠留着艱辛偉大的功蹟美名！「勤則有益」，「業精於勤」，這些格言是我們世世代代的父母家長用來訓誨子女的。中國直到現在爲止，尙是一個農業國家。在農國家裏，是男耕女織，父作子隨，兄先弟後，每一個人都有事情做，

每一天也不浪費的。美人明恩博贊美中國的農夫說：「天還沒有顯出一分魚肚般的白色，鄉下人已經絡繹不絕的到城裏去，有走十里八里的，有走三四里的，……一定還付過好幾個鐘頭，你才可以看見西洋人在馬路兩旁的人行道旁若無人的直闖；等到他們在寫字間裏坐定的時候，中國人一天的工作已經十去其五了」（註六）。中國人是如此的勤勞！中國的儒子學者，也是孜孜矻矻終年不倦的，懸梁刺股，囊螢映雪，在外國那裏能找到這樣的例子？禽滑釐之事墨子，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間欲，這種勤奮苦幹的精神實在是今日所需要恢復發揚的，建國的工作，艱而且巨，只有靠後方的人們加倍努力，前途才有希望。

第四、堅忍：「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文天祥在牢獄中作這二句詩，最足以表示中華人民的堅忍偉大！牢獄中陰溼腥臊，污濁穢臭，是不堪涉足的地方，但文天祥能居之四年之久，存養正氣，安然自得，這是何等的精神！就如我們這次抗戰，在未發動以前，是極端忍耐的，蔣委員長說過，近數年來我們對日的外交，十二萬分地負辱任重，甚至於有被外國笑爲民族性怯懦之表現者；但是最後關頭已破，和平已非忍耐可以求得，便挺身而起奮勇抗戰，雖然犧牲損失極爲慘重，而舉國上下仍堅固撐持，再接再厲，這樣既忍耐於戰前，又堅持於戰後，豈是一個平凡懦弱的民族（註七）？昔日左宗棠出師平回，遠行西陲，跋涉萬里，在中國的外國人又都笑他好大喜功，徒費軍餉；但是結果左氏却成功了！不到一年，他的軍隊就到了天山南北兩路。建樹許多戰功，到有供養不足之虞，便徵兵屯墾以求自

給，這樣一邊屯壘一邊進兵，便很迅速地把回疆在數年之中平定。到了那時，那輩坐於安樂椅裏的外國人們才口呆目眩地驚奇中國人的堅毅！此次抗戰中，可歌可泣的事情更多，上海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爲了爭人格爭獨立而寧死不屈，就是中華民族堅貞精神之表見。我們要用這種堅貞的精神來繼續抗戰，繼續抗戰！

上述勇武、博大、勤奮、堅忍四端，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也就是中國的國魂（註八）。總理昭示我們，「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舉國的同胞們，大家來努力，努力發揮這些偉大的精神，使他煥發於東亞，弘揚於宇宙！

四 回顧與前瞻

我們追溯四千多年悠久光榮的中國歷史，考究了中華民族固有的精神道德與精神，再審視現在中國所遭遇的實際環境，展念將來千年恆久的命運，心中便不由得引起無限的感想：

孟子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這句話實在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在心理學上，有一條最基本的原則，便是刺激生反應：外來的刺激越重大，反 的呈現也越強烈。防疫針的疫苗射進了身體，身體便會生出疾病的抵抗力。獎勵或懲罰的刺激施之於兒童，兒童便會努力向學。民族和國家也是如此的，如果沒有外來的刺激與患難，則此國家便怠惰鬆懈，易於墮落。所以從這方面來說，這次日寇

傳來乃有利於中國的。

但是，刺激過重過大的時候，却很有危險。舉例說，我們可以責罰兒童，却不能施之酷刑使成殘疾。我們可以接受牛痘的藥苗，却不能接受異性天花的疫苗。如果刺激的力量大於本身抵抗力時，事情便極爲嚴重。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的慘事，我們還不至於忘記。所以從這方面說，這次日寇侵來，乃是中國的不幸。我們的國防計劃未曾完成，準備工夫尙未充足，實在是憾事。

然則，事實已經演變到今天的地步了！一百年來許多外來的良好刺激，清廷沒有接受，自然很可惜而可恨！到了今天，兇暴的日寇傾其全力來滅亡中國；我們不抵抗也是亡國，則何如奮起抗戰？刺激固嫌太重一些，但若麻木不仁不作反應，就祇有坐而待亡任人宰割！我們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爲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祇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拚民族的生命，求最後的勝利！二年前 蔣委員長對蘆溝橋事變發表的嚴正聲明，是我們每個國民所應牢記在心頭的。

戰爭是不能避免的，而且已開仗二年了！這二年抗戰的結果，不但證明了中國不會淪亡，却反而證明了她是愈戰愈強，愈戰愈堅！由於上述我們民族有忠孝勇武等德性精神，故全國人民無不踴躍參戰，奮命衝圍。而天生成中華民族的堅忍精神，更發揮了最偉大的功能。蔣委員長一再指示我們：

「抗戰是國民革命必經的過程」。在國民革命發展的過程中，一切戰事是不能計較利害的，祇有憑大無畏的精神，爲主義爲革命而犧牲到底。美國的獨立戰爭，蘇聯的大革命，以及我國推翻滿清的革命，都是國民革命，都是與強大有力的敵方相奮鬥，而終於獲得勝利的。所以國民革命不是普通衡力的戰爭，乃是死裏求生的哀戰；哀戰的結果，一定是弱小者得到獨立自由。認清了這一層，便可以知道我們的抗戰是光明的。

並且敵人的本身也有許多脆弱腐敗可以致敗的地方。敵軍普遍地厭戰畏死，是犯了兵法上的大忌。敵國國內反戰空氣的濃厚，亦使敵政府深引爲憂。而金融的枯竭，工業的停滯，生產的銳減，火量費的不斷增加，處處都足使敵國崩潰瓦解。政府不能決定政策控制軍部，是多麼悲哀的事！由此觀之，今日的日本已非昔日可比，這個刺激已不如我們想像那樣強大。

歷史學者雷海宗先生把這次抗戰比擬爲第二次的淝水戰爭，是最恰當不過的。第一次淝水之戰，結束了上古到東漢末的文化學術，開創出後來隋唐宋明一千年天下。這第二次淝水之戰，意義更是重大：我們能否結束二千年來的專制政治，結束數百年來積弱衰頹閉關自塞的舊帳，而替子孫千代開一條平坦光明的牛路，使中華民族由此而復興光大，就在此一戰。

戰勝對方是有可能性的，將來的光明燦爛是有可能性實現的，這全憑人們自己的努力！優生學者潘光旦先生指出中華民族並不會衰老，而且正尙在青年。我們祇要認清了國民革命的性質，用更堅忍更良

感更沉着更奮勇的態度去參加這次抗戰，用至精誠至不變的毅力來挽回這歷史未有的奇變，則日後的生命正如花一般的美麗。抗戰勝利以後，我們的民族將永遠地輝映着蓬勃生動激揚亢爽的光明，燦爛的三民主義新中國也將於此出現，太平洋的永久和平與東亞文化的偉大進展，亦將於此奏出鈞天壯穆的歌聲！

時不我待，事在人為。中華民族的兒女們，猛進！猛進！

註一：在道德學上稱為前道德。至於唯物論者不知民生為歷史之中心，抹煞精神，蔑視道德，在道

德學是根本沒有地位的。

註二：參看溫公頤著道德學第七六頁，商務。

註三：見總鳳林著中國通史第一一二頁，鍾山。

註四：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蔣委員長五十壽辰之期，全國人民歡欣慶祝，戴季陶先生發表

一篇文章名為「蔣先生成就勳業之根本」，描述 蔣委員長的日常生括，並指出其成功之原因，以勵國人。該文之大意為 蔣委員長有所不為，才有所為，每天記日記，坦白心潔，才能擔當國家大事；結論是 蔣委員長乃一至孝至忠的人，所以才有偉大崇高的成功。

註五：參不戴季陶著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第三十七頁，政治部翻印。

註六：見潘光旦著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第九五頁，商務。

註七：這是 蔣委員長爲倫敦日日地報特刊所作的一篇文章，現載於 蔣委員長抗戰奮告輯要第一

一六頁。

註八：總理在民 主義中昭告我們，中國的民族就是國族，以中華民族的精神亦可說是中華民國之國魂。

一個民族受到意外的打擊，能夠有機會讓他考慮到種種失敗的原因，這自然是一件幸事。但是近百年來的歷史，給我們考慮的機會大多，人們能夠考慮到政治上的民主，人們能夠考慮到物質文明的科學，人們也能夠考慮到東西社會的差異，真正能夠考慮到民族精神而提出具體辦法的，百年來只我總理一人，能夠考慮到民族精神與民族道德的關係而躬行實踐的，便只總裁一人。

道德決不是思想上的推理，而是實際生活經驗的歸納，感覺道德重要的人，只有必定是長時期受過道德生活的陶冶，沒有道德陶冶的人，他一定對道德生活不會有迫切的感覺。中國的道德哲學，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下逮孟子，皆是人生實際生活經驗的歸納，自孔子而後，小人儒得勢，所以講道德仁說義的人儘管多，真正能夠懂得道德的人却是太少，所以王陽明氏良知良能的學說，對行字特別重視，與他志趣不同的陸九淵，講到君子墮於利時，也為道德惋惜。

為何在近百年史中，沒有幾個人能夠考慮到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這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我們的社會，能夠靠自己於道德生活中的人太少了，曾文正公常歎惜求一爭利不先赴義恐後之士不易多得，的確還是近代史上的一大缺陷。第二、能夠置身於道德生活中而真正為國為民的人，因為天賦的不足，與生活經驗的短促，而不能覺悟到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對於新中國的使命，所以也無具體的辦法。

民族精神，含著於民族道德之中，民族道德，寄托在個人的人生觀與全體社會氣節。不同的人生觀，與社會氣節，形成不同的民族道德，不同的民族道德，產生不同的民族精神，而影響到整個國運的盛衰。所以要挽救我們的國家，須當發揚我們的民族精神，要發揚民族精神，當培植社會道德，首先所應當做的工作，便是培植我們的人生觀與社會氣節。

一 中國人的人生觀與社會氣節

要培植人生觀與社會氣節，首先須得檢討過去的人生觀與社會氣節，過去我們的人生觀，一句話可以代表，即「樂天安命」；過去我們的社會氣節，也多半限於消極性方面。

樂天安命的人生，我們可以找出許多歷史的例證，帝堯時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文王時代所歌頌的「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與夫田夫野婦的「聽天由命」，都可以看出樂天安命的人生，在中國已根深蒂固。至於上層的社會，則樂天安命更澈底的變為樂天知命，老子的無爲主義，莊子的歸依自然，儒家的知天命，這一脈相通的樂天知命的思想，在歷史上到處可以找出蛛絲馬跡。歷代士人們恬淡的隱居生活，自六朝以下，更相習成風，不可挽救。

爲什麼會有樂天安命的人生？因爲我們是一個廣大的農業社會，幽閒寂靜的田園生活，啓發人們適依自然的心情，試看歷代的大思想家與事業家，莫不是景仰自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事業家我們不

必講，就是孔孟老子墨翟這一批思想家，他們都對自然發生特異的崇拜，孔子講五十而知天命，又言命與仁；孟子的師天；老莊的歸依自然；墨子的論天命；凡此皆可證明中國思想家的景仰自然。天命是什麼？如用近代的名詞解釋，便是「自然的趨勢」。但是當時的人們，並不是知天命而即樂天安命，易經上曾明白的指示後人，「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又講「知天命，盡人事」，可見知天命尚不如盡人事的重要，無奈後來的人們，不能夠有實際道德生活的經驗，他們只能體驗到知天命，知天命一變而為樂天安命，歸依自然：「盡人事」與實際的道德生活，却很少為人重視。

樂天安命的人生觀，在好的方面，是人民能夠知足，安分守己，維持數千年的農業社會；但是在壞的方面，却產生下列弊端：

第一、樂天安命的人生觀，便一切聽其自然，不圖進取，所以歷代的大思想家，都以寡欲相尚，道家固然不必說，儒家墨家必多半重視寡欲，漢武帝與汲黯論政治的時候，汲黯便提出「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相答：

第二、樂天安命的人生，便只追求身體上的安適與精神慾望的滿足，身體上的安適，由飲食起居中均可看出，在歷代的士人中，走路最得意的是「緩緩歸矣」，「安步當車」，運動最高興的是做內工的太極拳，在家居生活中，最流行的是深居簡出，在日常飲食中，最得意的是膾炙人口，這種只圖身體舒適的例證，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也到處可見，至於只追求精神慾望的滿足，在歷代士人窮心於草木詞賦

中，也到處可尋例證。

第三、樂天安命的人生，於是對個人以外的人與事，便取極端漠視而不負責的態度，假如閱讀一部中國人生哲學史，我們會可到處看到，在中國士人中最流行的思想，一種是「明哲保身」，「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危邦不令，亂邦不居，即令居亂邦，也要有居亂邦之道，一種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因窮而獨善其身，方可以不失道，達則兼善天下，方可以求保身。

這種樂天安命的人生觀，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的個人中心的人生哲學，所以這種人生觀有影響，便是個人對自己不圖進取，對社會不求負責，對全體不守紀律，陵夷至於今日，致為當前巨患。

歷代士人們能夠積極進取亟圖一責的，要算商鞅、王安石、張居正這一批人，他們真是中國歷史上
的孝子賢孫，在整個樂天安命的人生觀空氣中，他們都想用新的方法，養成新的人生，轉移社會的風氣。王安石答司馬光書中，嘗謂「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為善」，張江陵在答友人的書信中，也說「人樂於因循，事遷於敷衍」，雖然他們的辦法，或是社會環境太惡劣，不易辦道，或則是以強力辦通，無奈人亡政息，然而這種負責的精神，真可與曾文正這批成功的人們比

然而就整個歷史觀察，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畢竟是少數，大部份的人們，多半是明哲保身，無罪而殺士，賄大夫可以去，這與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並無分別，就是這負責的曾國藩，也始

終兢兢業業求保厥終，至於他人，更不必論，像管甯、劉伶、倪贊、王冕這一批人，歷史上到處都可以發現，漢宣帝時代疏廣疏受的請老，歷史上資爲美談，龐參之不能見容而作，致爲孝元所殺，成爲歷史家的警戒，由此可見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因爲歷史上的事實，更深深印入人心。

中國的社會氣節，源於戰國時代的俠義之風，像孟軻、荆軻這一批的俠士，雖爲法家痛斥，然而在整個的中國歷史中，俠義的風尚，却爲社會保留人類正氣。

真正有計劃培植社會氣節的，要算東漢的光武，光武目睹西漢氣節之不修，致成爲國家社會的太患，所以自定天下以後，極力彰揚氣節，培植學風，以爲社會培養元氣，東漢的節義之風，使桓靈末世，賢人君子輩出，均以寬扶社會自任，雖然賢人君子，不能救當時之衰微，但由黨錮之禍，士君子的赴義精神，確爲社會保留了正氣。就是亂世的好雄們，如曹操這一批人，也不敢明目張胆的爲所欲爲，他還要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周公自任，可見社會正義，使亂臣賊子也有所畏懼。

但是東漢的節義之風，畢竟被曹操的虛偽所粉碎了，曹孟德巧機謀，誘發了司馬氏的篡奪之心，自後三百餘年間，社會上便不知道有所謂氣節，當時社會上有兩種人，一種是曹操司馬氏一脈相承的野心家，如劉淵、劉裕、苻堅、桓溫這一批人，絕對的爲個人追求權勢，社會道德，民生幸福，並不易爲他們所重視；另種人是冷嘲熱諷的清談家，如山濤、阮籍、劉伶這一批人，他們是絕對的追求個人的享受，而對天下事不聞不問。前種人之所以猖獗，是因爲曹操敗壞了社會氣節；後種人之所以得勢，

是源於東漢節義之風的慘淡結局。

唐太宗是個有見識有抱負的人，他明瞭一個康樂的社會，端賴於淳厚的風俗，以維持社會正氣，雖然對建文元吉的處置受了不少歷史家的責難，但他的積極培植學風，獎勵氣節，即使社會逐漸蓬勃而有生氣，所可惜的，是他的私德終有不妥之處，所以唐代數百年的禍患，不是別的，却常常是宮庭內瀆倫喪化，因而形成大亂。

宋太祖取得政權甚為合理，取得政權以後，又有趙普這一批人輔助，繼他以後的太宗仁宗，又皆是鄧治之主，為社會培植了淳厚的風俗。到了南宋時代，又有朱熹、魏了翁這一批為社會培植正氣，所以到了宋代亡國的時候，朝多從容就難之臣，野亦多慷慨赴義之士，像文天祥、陸秀夫這一批末路英雄，的確為人類保留了不少正氣，使得元末起義的英雄們，精神上還有所維繫。

明代的社會氣節，經過靖難事變的打擊，所受損失太大，尤其鐵鉞、方孝孺這一批人的死難，對氣節是一種不幸的摧殘。于忠肅、張居正這一批人，也蒙受不幸之冤，使人們對天下事不敢多所過問。所以到了明末的時候，不獨無人贊助崇禎，就是到了亡國的時候，也不多成仁就義之士，像鄭成功，史閣部這一批人，與趙宋比較，終是少數。

社會氣節敗壞的結果，在平時則整個社會喪失是非公正的標準，在亂世則使大奸大逆，橫行而無忌憚，由魏晉到隋唐五代，社會往往因為沒有氣節而不容易維持，由趙宋到明社之亡，因為民族氣節的衰

張，致漢奸內應，構成亡國巨患。所以歷代亡國的問題，往往是漢奸的問題，而漢奸的爲患，便是正義不張，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今日要言發揚民族精神，培植民族道德，除了培植人生觀外，便賴扶植社會氣節。

讀了一部中國人在觀與社會氣節的歷史，使我們感覺到人生觀只是樂天安命，不是活潑而有生氣；氣節歷受摧殘，而不能爲社會培植正氣，所以我們的民族道德，並不能積極的樹立煥發有爲的民族精神。

二 新氣節與新的人生觀

但是歷史的趨勢，並不是全非人力所難挽回，顧亭林、王船山這一批孤臣義子，歷睹明代的慘淡結局，是由於人生觀與社會氣節的不良，所以他們立說授徒，大聲急呼吶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指示樂天安命的人們，改變他的人生。王船山的講學，也確實爲社會扶植了一股正氣，所以清末有所作爲的人們，無論是曾、左、彭、胡，或是譚嗣同、黃興、蔡松坡這一批人，他們都是直接間接受了顧炎武、王船山等精誠的感召。

曾、左的負責精神，使中國人的人生觀逐漸轉變，人們再不僅是講求樂天知命，除了知天命以外，還要盡人事，以挽回變局，尤其曾、左的成功，更使很多人相信盡人事較知天命更爲重要，譚嗣同等六

君子的戍戍殉難，不獨對舊的人生給予迎頭痛擊，對當時的社會，也培植了一股正氣，新的人生與社會氣節，使當時的人心興奮了，社會道德很快的爲之一變，於是一發而爲辛亥革命。

但是新的人生觀與社會氣節，很快的受到袁世凱的武力與金錢的摧殘，民元到民八年，幾乎是一個黑暗的年代，然而——總理的革命精神，深深的印入青年的腦海，蔡松坡的道德氣節，浸入每個熱血志士的心中，武力與金錢，並不能摧毀社會道德，却反構成袁世凱的敗亡，五四運動發生了，「什麼是人生？」又在北方有人呼喊，革命的烈火，隨着新的人生觀而遍滿了中華。

五四時代中國學生的精神，不只燃起了革命的烈火，也使世界人士，對中華民族的精神，得到新的認識，巴黎和會對中國另選了新的態度。但是五四運動的缺點，人們只問到人生觀，沒有放慮到社會氣節，當時宣言中曾載有「內除國賊」語，試問不培養社會氣節，使亂臣賊子有所畏懼，國賊如何能夠清除？

總理的慧眼，看清了歷史的事實，所以一面叫青年要立志做大事，建立爲社會服務負責的人生觀，

一面却諄諄告誡全國人民，要發揚民族精神，培植民族道德，建立社會的楷模。

總裁以他的學生的革命經驗，體會——總理的革命精神，所以他提出兩句話，即「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間繼起之生命」，以爲社會建立人生觀的標準，這種新的人生觀，便是勞動的人生觀，服務的人生觀，牠——哲學基礎，是「盡人事」而並不只是知天命，牠的產生原

因，是最時期道德生活經驗的歸納，而不是思維上的推演。

總裁的道德哲學，因為他本人的精誠感召，使中國人的人生觀，大部分改變了，中國社會，今天使人感覺到都是正氣，當人們讀到孟子所講的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的時候，往往不懂孟子的真義，現在領略這兩句話，的確知道另有一番意味。

這次抗戰的結果，是中國人的人生觀與社會氣節的一個試驗，真金不怕火，板蕩識忠良，那個人的生觀確定，那個人有氣節，社會氣節對於亂臣賊子的彈壓，這次一一的表現出來了。

由這次的抗戰，使我們得到幾點啓示：

第一、一個人生觀與社會氣節的培植，正如個人的身體健康一樣，貴在平時。平時能夠多用一番功夫，在亂時國家便多一股正氣。這次抗戰的結果，證明中國軍人尚有作爲，但這是總裁十餘年作育人材的結果，假如我們的文學校，我們先代勳父兄，能夠有人以身作則的像王船山、顧亭林那樣教育青年，能夠像總理那樣的對青年潛移默化，爲社會培植正氣，爲人們定立人生的目標，這次抗戰的結果，即令沒有效死勿去的文臣，也不會有王克敏、梁鴻志等這樣多的叛逆。

第二、良知存在於每個人的天賦之中，只要有人啓發，良知的發現，便是社會道德的拾遺。在這次抗戰以前，有許多人並不能爲社會顧計分滿意，然而同胞的厄難，啓發了他的良知良能，獨軍相率歸正，有野心的人，也放棄了私慾而爲民族爭求出路。

第三、人生觀與社會氣節相互爲用。到了個人的的人生觀發生不正常的變化時，如王克敏、梁鴻志這批敗類之附逆，便需要社會氣節與國法加以制裁，使亂臣賊子有所忌憚。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東漢培養氣節，亂臣賊子不敢亂所作爲。假如我們的社會在平時能夠多用一番力量培植民族氣節，在戰時便可少一批媚敵誤國的敗類。

新的人生觀與新的社會氣節，在中國正在滋長，中華民族已在歷史廢亂中培養了他的民族道德，發揚了民族精神，當前的問題，便是如何使之潛移默化，深入人心，使全國人民，能夠受到精誠的感召。

三 怎樣培養民族道德以發揚民族精神？

要使勞動服務的人生觀深入人心，用遠觀有爲的精神，以轉移舊時代樂天知命的態度；要使愛真理尚正義的精神，深深入人意表，爲社會培養淳樸的節操，我們希望政府及有志的社會人士，注意下列數事：

第一、一種人生觀與社會氣節的培植，往往賴於社會上少數有心人的精誠感召，左光斗的死，誘發了史閣部成仁就義的決心；顧炎武、王船山的立說授徒，爲社會培植了不少正氣；蔡松坡的赤忱，轉移了袁世凱時代動亂的人心；總裁的立志爲國爲民，挽回今日的歷史變局。可見良心存在於每個人的天賦之中，只要有有心人的努力，便可爲社會國家建立千古不滅之功。近數十年來 總理與 總裁的努力，已

使全國人心轉變，頑夫思廉，懦夫亦有立志。吾人所希望者，是全國社會上有心的人們，效法左光斗，效法顧炎武、王船山，效法蔡松坡，效法 總理 總裁，爲社會作個完人，爲人類樹立正氣，你們的精神感召，便可使我們的社會多幾個史閣部，多幾個魯、左、彭、胡，多幾個爭利不先赴義恐後之士，爲社會培養了淳樸的道德，爲國家發揚民族精神。

第二、二種新人生觀與社會氣節的培養，端賴於社會上有淳厚的社會情操，當我們讀到南國被文王之化的時候，感得情操的培養，對於社會的維持，特別重要。柏拉圖的共和國，固然常常重視藝術（音樂、文藝），以求社會生活的和諧，就是中國的道德家如孔子等，也特重視禮樂，思圖培養情操，達到社會生活的調和。在亂世依賴氣節，在平時則賴社會情操，就一般的趨勢講，平時總較亂時爲長，所以要培養淳厚的民族道德，便有賴於社會情操。社會情操，可以啓發人們的同情心，可以增加人們的生活樂趣，可以培植遠觀有爲的精神，可以養成仁民而愛物之德性。今天要想培養社會情操，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厲行社會教育，提倡正常娛樂，提倡樂藝，爲社會培養淳厚的風俗，就是培養了民族道德，也發揚了民族精神。

第三、我們今天所覺得最嚴重的，便是我們國民的身體較差與團體精神缺乏，社會氣節與社會情操，如沒有個人雄健的身體與團體精神，他便是在一最不穩固的基礎上面，證之歷史的往事，我們看見許多有爲的人物，如明神宗等，都因身體的虛弱影響到他那遠觀有爲的人生，至於團體精神之缺乏，更

是當今之通病。

所以要想培養民族道德，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嚴格地執行軍事訓練，一以鍛鍊我們青年的身體，一以培養團體的精神，健全社會的道德，寄托健全的身體與團體精神上面。除了軍訓以外，我們希望社會有正當的娛樂，學校有優異的自治精神，以培養愛公樂羣的習慣。

今天中國正需要培植社會氣節以發揚民族精神，總裁已以身作則為社會樹了新的規範，我們希望有心的人們，千萬不要放棄了好的時會。

四

劉琦

什麼是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

民族道德是民族各成員社會行爲的共同軌範。它的產生必根據於民族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所以各民族有不同的道德信條和道德觀念。但道德信條縱有不同，道德觀念容有差異，而維繫人類社會關係，促進社會生活的功能，並無二致。

中國民族道德，是隨着儒家倫理思想而發展而充實的。人不能離開社會單獨生存，因之不能不發生社會關係；既有社會關係，不能不發生倫理現象；既有倫理現象，必產生倫理思想，所以無論氏族社會、封建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必各有其特定階段的倫理思想；倫理思想的轉化，一部分成爲宗教，一部分成爲法律，一部分成爲道德。儒家倫理思想體系的建立，早在二千年以前的東周時代，因爲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商業資本的發展和貴族政治的崩潰，社會起了劇烈的變革，紛爭擾攘，靡有甯日，於是新秩序的建立，成了普遍而迫切的要求，當時一般學者，不論持消極的或積極的態度，而求社會的安定和人生的解答，却爲共同的目的，於是諸子百家，爭相媲美，造成中國上古學術史上的光輝，但最能把握社會核心和時代要求的，祇有孔子所領導的儒家；儒家學說，無論是人生哲學、政治哲學、教育哲

學，乃至軍事學，莫不以倫理思想為基礎；而倫理思想的重要部份，即是道德。

中國的道德思想，本極廣泛，然而歸納起來，無外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就是中國民族的固有美德。

道德觀念隨社會的變化而變化，決非固定的，所以在封建時代講「忠」，是忠於君主一人，現在「忠」的意義，是忠於民族、忠於國家、忠於自己的責任和事業。古人講「忠」，充其極點，就是一死，所以死難殉職，稱為「盡忠」。現在敵人企圖滅我國家，毀我民族，正是我們「盡忠」的時候，我們必須具有舍身為國的決心和犧牲精神，以爭取民族的澈底勝利。「孝」更為倫理思想和道德思想的中心，它的原始內容，為對父母對祖先的恩德的報酬，這種狹窄單純的概念，還不能完全表達「孝」在今天的意義，我們現在對國家民族盡孝，不僅要報酬祖先的恩德，還要繼承並發皇他們的遺業，中國一百萬方里的土地，四千餘年的文化，都是祖宗先民苦心創造慘淡經營的成果，我們必須保全國家的生存和民族的獨立，使他們的遺業，更發揚光大，那才算是大孝。「仁愛」為人類精神中潛在的德性，發揮這種德性，才能忘乎物我，一視同仁；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韓退之說：「博愛之謂仁」，可見「仁愛」就是同情同感相互體驗的心理作用，是與生俱來，非由外鑠的。但所謂「仁愛」，並不是沒有差等，沒有分寸的，荀子說：「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這是說「仁愛」並非不辨奸邪忠良的姑息行為；孔子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是說「仁」代表個人的人格

和氣節，有人格和氣節，才有一種堅持剛毅的殉道精神。我們在抗戰的進程中，固然要愛護自己的同胞，但對認賊作父的漢奸，必須給予無情的打擊。同時還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殉道精神，以盡忠於國家，盡孝於民族，那才真正發揮了仁愛的美德。「信義」也是中國民族固有的美德。禮記：「義者，宜也」，韓退之說：「行而宜之之謂義」，看這兩種解釋，可見「義」是一種合理的行為；能夠貫徹或堅持合理行為的「精神」就是信，所以左傳上說：「信以行義」，孟子也說：「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外，「義」還代表一種爲正義爲真理而犧牲的大無畏精神，所以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這種精神，應用到抗戰方面，就是不屈不撓，抗戰到底。愛好「和平」，更是中國人的特性，總理說：「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但「和平」決不是怯懦、柔弱，更不是無抵抗的任人宰割，所以孔子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老子最尚和平，認爲「兵」是「不祥之器」，然而也不能不承認「不得已而用之」。所以「和平」固然是我們的美德，可是在抗戰的現階段，決不能誤解「和平」而退讓妥協，在「和平」的烟幕之下投降屈服。——否則，就是民族的罪人，革命的叛逆！

這是中國的民族道德；中國的民族精神是什麼？概括起來，可分兩種：創造精神和戰鬥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適應環境或改變生活的能力，所以民族的生活環境對於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決定作用；因此，生活在寒帶與生活在熱帶或溫帶的民族，各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各有不同的民族精神；生活資料豐富與生活資料匱乏的國家，各有不同的民族精神。

據現有可信的史料，中國民族最先的活動區域（定都以後）是山東、河南、安徽的北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這一帶土地肥沃，氣候溫暖，所以生產方法雖然簡單幼稚，但生活資料的獲得，不算十分困難。既有這樣優越的自然環境，就易於運用自己的智慧，增進生活，所以創造精神特別強旺；當殷周時代，今日文化最發達的歐美還過着原始人的野蠻生活，而中國文化已光輝燦爛了；無論哲學、政治、經濟、倫理、論理各科學，就是在現在的學術思想上，仍不失為寶貴的遺產，其他如天文、氣象、歷算、和製造方面的指南針、火藥、紙等，雖然是零碎的知識和偶然的發明，但都足以證明創造力的強大，至於文藝、彫刻、繪畫，雖曾被認為「雕蟲小技」，然而那不可磨滅的光輝，必永遠照耀於世界。

中國民族精神的另一種表現，就是戰鬥精神。

中國歷史上的特殊現象，要算民族鬥爭。如以漢族為主體，就寫禍最烈的說：先秦時代有夷、狄、戎、蠻、漢有匈奴，晉有五胡，唐有突厥、回紇、吐蕃，宋有契丹、女真、蒙古，明有滿洲。但是歷代雖受異族的侵略，而除宋明兩朝的政權，曾被擄奪外，中國民族都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或是驅逐他們出境，或是同化他們。本來，高級文化必然同化低級文化，但一個高級文化的民族，要是沒有戰鬥精神，

就不一能能夠誇誇低級文化的民族；反之，低級文化的民族未必要有戰鬥精神。也或以從歷史上看，那些歷史學家大認爲民族，這類事實，不必從歐洲史上舉例；宋亡元初，明亡清，就是前者的例證；有些歷史學家大認爲苗族文化高於漢族文化，然而苗族反被征服於漢族，就是後者的例證。可見民族鬥爭的勝敗，民族文化的化，固然重要因素，戰鬥精神，更是重要因素。中國民族每經一次鬥爭，民族勢力就擴張一次，終達於今日融合漢、滿、蒙、回、藏、苗的大中華民族，這就是戰鬥精神的成功。

二 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對民族盛衰的關係

一個有強烈道德信仰的民族，平時必能互信互諒，親愛親誠；外侮進逼的時候，必能發爲冒險犯難的犧牲精神和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文山先生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口浩然，沛乎塞蒼冥」。這里所謂「正氣」，在個人爲個人人格，在民族爲民族氣節。民族氣節，正是反映民族盛衰的一面鏡子。

從歷史上看，周朝的晚期，經過數百年的擾攘，社會秩序紛亂，人民道德墮落，大者篡弑君，小者蕩法逾節，綱紀廢弛，禮義淪亡，因此更促成政治的腐化和王權的旁落，結果被滅於秦。漢代初年，八精神振作，奮發有爲，政權固以鞏固，社會亦以承平，武帝更注薄儒術的昌明，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儒家因而造成劃時代的發展，但一般知識份子，大多重功利，輕道德，即皇室御用文士，對個人道德，

也毫不遺憾，此新莽屠攝，頌德獻符的無恥之徒，比比皆是。光武中興，撥亂反正，於是表裏氣節，一

砥礪道德，社會風尚，因以大變。降及魏晉，社會腐化，國勢陵夷，迨五胡作亂，晉室削弱，在左偏

安，亦輩代而亡。當時國民道德的墮落，民族氣節的喪失，也可謂達於極點。顏氏家訓：「齊朝有一大

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子，年已十七，頗好書疏，教以鮮卑語及雜語言，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

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堂堂大丈夫，乃國家的高級官吏，不但毫無殉國死節舍身復仇的精神，反認

敵作父，覬覦事仇。真所謂「朝鮮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之士」，影響所及，遂至國家解體，民族式微。

一般所謂上流人者，既鮮廉寡恥，傳播了腐蝕社會的毒素，內憂外患，自然相因而至。永嘉末年，石

勒、劉曜、殺人虜妾，胡騎所至，廬舍坵墟，獸行一發，屍骨山積，漢族遺孑空前的浩劫，國氣元氣，

斷喪殆盡。所以清朝雖能恢復統一局面，仍不免異族的侵略，追源禍首，那班官僚，實為罪魁！

五代是中國歷史上的黑暗時期，也是中國民族道德最墮落的時期，如果朝顯貴的馮道，竟歷事唐、

晉、漢、周四姓十三君，不以恥，反自誇為「長樂老」；石敬瑭割燕十六州，臣事契丹，更自稱

「兒皇帝」，真有史以來，無恥之尤的奴才。南宋中國歷史上外患最烈的時代，但邊疆求和，拋隆金

人的還是漢族的秦檜，最初番預元人軍事機謀的還是漢族的劉秉忠，元兵南下，還是得救漢族的劉整

和呂文煥，至元十五年，率兵犯閩粵，執文天祥於五嶺坡的還是漢族的張瑄，他並藉勸誘文天祥跟着

他一道漢奸，他說：「國亡，丞相忠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之（元），將不失為宰相也」，他不但

漢朝這一位民族英雄，屢此一戰，逼着宋帝退海自盡，不絕如縷的漢族政權，終被斬斷。他出賣了民族，反鞭石崖山，大書特書：「張宏範滅宋於此」，視醜行為光榮，真禽獸不如。滿清入關，明室滅亡，不是由於張獻忠、李自成的作亂，倒是由於洪承疇、吳三桂的通敵。清初四王也都是漢族的頭貴。從這些事例上看來，中國幾次被異族征服，都是自己民族的敗類所招致的，這種歷史的悲劇，在抗戰的今天，更值得我們引為嚴格的教訓。

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是互為因果的，民族道德墮落，民族精神必然喪失，如上面所舉的魏晉、五代、宋、明朝的末葉，社會道德固然墮落，人民精神也非常消沉；悲觀厭世，苟且偷生，頹廢荒唐，萎靡不振，縱慾聲色，不問國事，所以引起民族式微，國家解體。反之，有高尙完美的民族道德，必存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國於大地，必有興立」，這是說一個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必有一種原動力，這個原動力，就是民族精神。中國民族因為富於創造精神和戰鬥精神，所以才造成過去的光榮，我們略一考察史乘，就可了然。

中國民族勢力的擴張，始於周朝，周朝社會繁榮，文化進步，典章文物，燦然大備，當時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如政府組織，東海制度，交通、水利、墾殖、林業、天文氣象的觀測，都設官分職，體制嚴整。但周朝的政權，外強中乾，還不能算真正的統一，秦始皇削平六國，廢封建，設郡縣，採取中央集權制，更從教育思想上，實行統制政策，才有真正統一的國家出現。他那樣的開明專制，頗類

於現在的極權國家。用現代的眼光看來，當然是反動的，違背時代的，但在二千年以前的封建時代，却
 是驚天動地的進步。漢高祖得政權以後，封建郡縣進行，經過高、惠、文、景、武帝的勵精圖治，經
 過繁榮的社會安定。漢朝開國以來，最嚴重的外患，就是北方匈奴的侵略；對付匈奴的方法，起初用傾
 軼攻，想從外交上取得敵人諒解，這種妥協政策，徒然增加了侵略者的氣焰。鼓勵了侵略者的野
 心，使奸諂諂諛，並無親善的誠意，這才一反傳統的退讓政策，改用軍事力量，實行民族自衛，於是先
 衛霍傲青，霍去病等的北征，結果匈奴失敗，進入歐洲，引起日耳曼民族的大遷徙，歐洲文化的進步，
 這是一個間接的力量。平定匈奴，是漢朝最大的軍事勝利；通使西域，要集漢朝最大的外交勝利。西域
 是現在的新疆，共有三十六國，漢朝用政治手腕，使它們屈服，並用援助抵抗匈奴；這對於中國民族的
 融合和文化的交流有很大的作用。漢代的文化力量，備沿漢水入長江，當時的粵江流域，還算化外，直
 到唐朝，才完全同化。唐朝征伐突厥、吐蕃、高麗、百濟、暹羅等族，領土的拓殖，過於漢朝，尤備
 得敘述的，是文化的發達；日本軍閥今天數典忘祖，企圖毀滅我民族，實則不但他們祖先的血管裏流着
 中國人的血，而他們又承襲着中國的文化；唐朝就是直接的傳播者。宋承唐後，內有國賊，外有強敵，
 終趨傾覆，但因岳武穆的精忠報國，文天山的成仁取義，陸秀夫的舍身全節，流風餘韻，足以保存天地
 的正氣，激發民族的精神，因而才有明太祖的光復。明朝的貢獻，除輸入歐洲近代科學外，要算海洋交
 通的發展；他曾先後派馬木、李興、尹慶等出使暹羅、爪哇、蘇門答臘等地，鄭和的南下洋，更是歷史

上的佳話。他們把中國的文化傳到南洋，使那些本著地會持有動結好中，開始了中國影響南洋的繁榮；南洋羣島所以有今日的繁榮，大半是中國人的成績。由此可知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對民族盛衰的密切。這種歷史的昭示，正是我們在抗戰建國的進程中，應當體認和把握的。

三 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是解放民族復興國家的先決條件

我們知道中國的國難，並不始於現在，近百年來，幾無日不在國難之中。由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由武力的壓迫，進而為政治的操縱和經濟的掠奪，使中國外而喪失獨立自主，降於次殖民地地位，內而分崩離析，陷入封建的割據狀態，使中國政治上經濟上的危機，日益加深，中國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也因以顯著，而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實為主要矛盾，自「九一八」至「七七」，就是這種矛盾的最高點。因為日本軍閥集中各帝國主義者一切侵略中國的陰謀和罪惡，以行其毀滅中國民族毀滅中國文化的企圖，所以在歷史的現階段，我們最高的任務，為不妥協，不屈服，以至民族的力量，堅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和壓迫，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和生存，並努力現代國家的建設，從政治經濟上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自拔於次殖民地的淤泥地獄，這就是「抗戰建國」的使命。完成這個使命的先決條件，是提高民族道德與發揚民族精神，提高民族道德與發揚民族精神的作用，可以加強組織力量，自信心理，自強精神。

道德的目的，既在維持人類社會關係，必含有加強人類社會組織的力量。中國固有道德信條，在個人內在的修養爲「仁愛」，由「仁愛」擴張及於父母爲「孝」，及於君王爲「忠」，及於朋友爲「信義」，及於其他任何個人爲「和平」；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樣由倫理關係加強社會關係，愈加強社會關係而加強民族組織。無組織，即無紀律，無機能，力量也無由產生，所以我們的抗戰，與其說是武力的對比，無庸說是組織的鬥爭，組織堅固必勝，組織散漫必敗，因此，欲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非有堅固的民族組織不可，否則，「離心力」大於「向心力」，不但一切努力與奮鬥，將無以致其功效，且將立見亡國之痛。

我們有組織力，還有自信心。在大時代的洪爐中，固然鍛鍊了不少的民族戰士，也暴露了一些民族的軟弱；他們祇看見民族前途黑暗，沒有看見黑暗中的光明；祇看見抗戰進程中的失敗，沒有看見失敗中的勝利，於是悲觀、消極、臨陣逃脫，乃至屈膝投降！這都是由於喪失了民族自信心的結果。提高民族道德，發揚民族精神，就可以加強民族自信心；從民族過去的偉大，認識民族生命力的強烈；從民族過去的光榮，認識民族前途的光明。

提高民族道德與發揚民族精神的作用，還可以激勵民族的自強精神。在過去，中國民族與異族鬥爭的結果，異族都被同化，中國文化和民族勢力即有一種新的發展，但到了現代，中國民族與世界列強接觸之後，這種光榮的事蹟，毫無所見，而民族危難，反日益加深。推其原因，固然是客觀的經濟情形所

(四) 民族精神與道德

形成的，而主觀的自強精神的喪失不啻不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們要使落後的中國，一變而為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非建立民族自強精神不可。

我們唯一的任務，是從抗戰建國的過程中，解放民族復興國家，欲解放民族，復興國家，必從政治上經濟上的改造着手，欲改造政治和經濟，必先有民族的改造，然後才能推動事實。提高民族道德與發揚民族精神，正是民族改造的必要工作。

四、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喪失的原因及恢復的方法

從歷史上檢討，中國民族開化最早，文化最發達，確實是我民族史上的光榮。然時至今日，一與現代文化接觸，即表現了萎靡無能的陋相，幾至國家民族淪於萬劫不復的地位，回憶列祖列宗締造的艱難，真不勝慚愧。但考其根本原因，不能說不是由於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喪失的結果。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的喪失，當然不是單純的意識，自有其歷史的和社會的背景；大概說來，下所幾種，較為重要：

第一、前而會說過，中國自秦漢以後，迭受異族的危害，其間一亡於蒙古，再亡於滿清，滿清初用暴力政策，大肆屠殺，以鎮懾人民，繼之以漢制漢的陰謀，使一般高等知識份子受利祿的誘惑，作了異族的助而不自覺。這樣遂其長期統治，民族意識，因以完全消沉了。

第二、在過去，中國思想界完全充塞着孔孟抑和老莊的思想，這兩派有時互為消長，有時平分春

色，支配了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老莊思想的本身，雖不及儒家理論的嚴重現實，切合實用，然在社會動亂時期，那種博大精神的虛無思想，最容易被人接受而且歡迎。從漢末到魏初，正是社會動亂的開始，又加政變和黨禍的結果，使一般知識份子日趨消極悲觀，老莊思想，因此乘勢勃起了。魏正始間，何晏王弼等，提倡於先，阮籍嵇康等，接踵於後，此唱彼和，你響我應，社會風尚，為之大變，所謂士大夫之流，非陷於玄想，即墮於頹廢，整個社會，充滿了浪漫的享樂主義者和空幻的虛無論者，「口談虛浮，不遵禮法」，就是那班名士們的人生哲學。當時持反對論的裴頠曾有一針見血的批評，他說：「玄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虛官不舉所司，謂之權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廢達；設無禮之風，以凌遲之。可是少數人的反調，不容易挽回社會的沉淪，所以消極、悲觀、頹廢、浪漫、享樂等存在於現象，仍然是國民生活的特徵。

第三、影響中國社會的另一種思想，要算印度的佛家思想。印度文化本是世界上優美文化之一，它給予中國的影響，也非絕對的壞，但印度與中國的民族生活不同，思想的形式及內容，當然不同，也未必能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而且像那樣的出世觀，站在中國兩立場說，畢竟壞的成分多。佛家思想主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這雖然失之偏激，但佛家思想之披靡一世，實由於佛家思想，哲理精深，又適合當時一般人的胃口，所以一經政府官局的提倡和文化的推進，就風行草偃，競相崇尚，弄得光顯和尚，遍地皆是，雲遊江作，也幾乎成了主要的文化事業，鳩摩羅什在長安

西明開及道通國樂合八百多文化相尚，從事翻譯，規模的宏大，可以想見。然影響所及，便政府人民都忘記了自己的事業，轉騰了進取的精神。

由於這種種原因，使中國民族道德墮落了，民族精神消失了，進而陷於淪陷的危殆境地。我們反求本源，要解放民族復興國家，不能不以提高民族道德與發揚民族精神為基本工作。其注意方法，約略誌

一、國民生活改造：「生活者，精神之根本，無合理之生活，即無健全之精神」。近來歐戰多戰，勤的生活，可分三種類型：一是有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一是縱欲無節的享樂主義者，一是醉生夢死的好安主義者，民族解放戰爭的號角，並沒有完全震醒他們的迷夢，並沒有完全蘇醒他們麻木。這類人，看起來除不顧眼外，似無多大危險，實際上，他們就是烈性的毒素，可以破壞社會的秩序，國家毀滅。因此我們談提高民族道德發揚民族精神，首先必須將不合理的羣體生活，加以徹底的改造，根據新生活信條使給養廉恥，貫徹於衣食住行，養成蓬勃奮發的朝氣，和明體操，知廉恥，守紀律的品性。

二、國民精神改造：總我說：「……反對身有社會，則基礎之團結難定，精神之統一殊堪憂慮。勇奮發之表現所在多有，而頹廢散漫之狀態亦同時並存，組織之懈弛，基礎之薄弱，如兔之國民精神，何堪負荷國族興亡之重任？」這種痛切的昭示，正是我們應當深體諒的。為求天時，我們所須要的精神改造，不僅要養成積極、熱烈、剛毅、果敢、奮發的性格，還要養成科學精神與法治精神。我們得了精神

現在的社會科學的世界，不但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要用它來說明，就是人類的精神作用也要用它們來說明。它的權威控制了一切，它是在服自然，改革社會，發展文化的動力。民族興替，國家的盛衰，為文化發達與衰微，生產的進步與落後，都以此不能不受科學和運用科學為根本的分歧點。另一方面，我們還要養成法治精神。所謂法治精神，在個人為守紀律，重秩序，在國家為法令制度的統一性及絕對性與尊嚴性，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無論它的國體政體若何差異，而同樣充溢着法治精神。我們現在高呼刷新政治，改造政治，法治精神正是「刷新」和「改革」的基礎。

三、國民思想改造：所謂思想改造，就是確立共同的信仰。信仰是行動的標準，個人無一定的信仰，則個人的行動必朝三暮四，無所定止。全體國民無一定的共同信仰，則個人一己之利，寸人寸義，漸至彼此猜忌，互相傾軋，所謂「我信不降，汝信不生」，終必意見紛歧，行動乖離，所以我們必須糾正紛雜錯亂的思想，擁護共同的信仰，就是三民主義。我們必須集中力量在這個最高原則，共同奮鬥，以完成新國家的建立。

宋教仁在五個月的血鬥，已經奠定了民族復興的基礎，這時候，祇要合全國為一體，根據同一的道義觀念，發為同一的精神力量，在共同目標下，從事救國建國，則任何艱鉅，必可克服，民族前途的光明燦爛，亦即鑒造於此。

頃閱報端，載有民憲週刊徵求關於「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論文啓事一欄，筆者對於寫作，向無心得，惟對於徵文題目，頗感興趣，具有骨鯢在喉一吐為快之感。故特不顧文詞之生澀，內容之淺薄，草擬下列小文四則，倘所讀者教之，一忠，幸甚。

何為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

一民族能立國於世界，必賴其所以能立國之民族優點存在。中華民族立國於世界已五千餘年，其間雖經過許多治亂興衰之過程，然整個中華民族，仍能維繫其民族生命於現在，這充分證明了中華民族之有適於民族生存的優點。此種優點即為該民族之道德，有此道德則存，無此道德則亡。亡國原因雖有內外之分，然大抵由內在原因而亡國的多，否則，雖一時有為外力所屈服箝制之事，然不久仍有復國之希望。如今之土耳其，德意志皆是。由於數千年來養成之民族道德，綜而合之隨成爲一種該民族所獨有之民族精神，此種精神恆代表其民族之特性。民族之道德互異，故民族之精神亦各有不同，然其均有民族生命維持上獨一無二之要素則一。據民族學者巴克(Ernst Barker) (王世憲譯，一〇六頁)所著之「民族精神要素之存在，非民族分子所自知者，必須經由日常生活發生密切關係，始有所自覺。換言之，此

種不知不覺而存在之民族精神，每於該國狹隘於非常時期，則易發而為不可抗之勢力，以應對危局。此

點即如個人，非常遭遇時，由一人之日常入路道，雖其遭遇相同，而各人之應對則互異者相似。如抗

戰時一絕對不變的事實。然由各人適應之不同，有抱絕對樂觀者，有抱絕對悲觀者，而此為其對者。由

此而成之民族亦然。故各民族有各其獨特精神，如德國之「德意志者於一切」之精神，即德意志

精神，由其語言之，自有是非之可論，然此種精神即由各德意志民族各其獨特之德意志精神之總派

現。歐戰時法人死守凡爾登要塞，由一士兵於臨危時發出「不許德國人進佔」的怒吼，而德意志國以

「不准德國人過去」的普遍情緒，亦即法國人之民族精神發達極高之表現。又如漢音人之「漢

蘭！愛爾蘭！我們可憐你！我們悔不及早愛你！」均為由於該民族之精神發達極高時之精神來噴

禁的表露。又如最近希特勒之強併捷克，而捷克人民於臨行時有向土地狂吻而去者，此亦民族精神不甘

屈服之表現。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延續至今，亦即由於我們有偉大的民族道德與精神的結果。吾國古來之

民族道德，多至不勝枚舉，然冷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即為吾民族之民族道德。遠

之如蘇武之守節，文文山之正氣歌，以及歷代偉大人物之行動言論，均為民族道德精神發展至最高度之

總表露，其情形之熱烈，有如神浮於自然狀態之火烟中，一霎那而不自知其熱乎又如槍彈射入人身之

寸刻，而不自覺其痛苦（見戴季陶先生日本論）。有此民族道德，所以才能對國家盡其至忠，對民族行

其大孝。有了此種民族精神，所以始能百折不撓，視死如歸，為國家民族之存續，醫治最後血液之一

海亦所不惜。為大多數的種族而犧牲自己的利益，為較高的目的，而犧牲較低的目的。請看則

此種舉動以遠，前後方各種的歌唱泣的事蹟，亦為此民族道德之表徵。城之血戰，六百壯士之悲壯，活埋殉父子之殉國等等悲壯英雄事蹟，豈非此最高尚的某物。即民族精神，非純粹的靈魂之所集。且日軍所圖之徵，其目的在於滅亡中國，其與此種精神，非與此種精神自異，其與

由此可知民族道德與精神，為該民族生存所必需，有之則生，無之則亡，其雖隱而不見之某物，然每種之血液中均有之，如能發揮光大，即能作出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

(一) 為何必須發揚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

中國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一民族之所以衰亡，必有其招致外侮之由，其最大原因，即為國民道德之喪失。民族精神之頹唐，見小稱而忘大義，舍大我而顧小我，麻木不仁，自私自利，於是則外侮至矣。再民族此次所受日寇之毒恥大辱，亦復由於民族道德喪失之所致，此為四五年來所確信不疑而大聲疾呼者。全國上下整個浸淫於自私自利之中，知有我而不知有國，貪污懦弱，因循麻木，知國難之深而徒自嗟呼，不思救國復仇之方。所以才造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的大國難。

世界歷史中由於民族精神之喪失，民族道德之墮落而弄成亡國慘禍，終而由於重新振起了民族的自衛心，遂使國家民族由危急中復興者，頗多先例，如百年前之普法戰爭，即是為我們的鑑。現在為開

明也何必憂其民禍禍論不為嫌其段與德來做證明。百手前之會者會也，唯其後是也。其五其國

法之世故法德之德也。德也。德法之強德之期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法德接壤，拿破崙欲征服全法，必先自取入手。這如日意之欲佔全中國，必先佔領東北相同。一八〇六年，拿破崙以破竹之大

軍，衝入德境，德政府軍禦之，為敗。耶那，即今之柏林，亦為法騎所蹂躪，德政府不得已而遷都於千尼司。此知如日意佔我南京，而我不得以遷都於重慶相似。拿破崙以其鐵騎勢力，組織萊茵河十六小邦為同盟，各雖自治，實即傀儡，此又與敵人在我境內之製造偽組織相同。後又迫德訂城下之盟，其條文中最苛者為：

(一) 全德軍額不得逾十萬人

(二) 德政府未償清法賠款前，法軍有駐德各要塞之權。

然當時之德國，人民積唐失望，政府懦弱因循，請亡亡國，亦非過言。然卒由於大哲學家非希德氏在柏林法軍監視下，舉行了十四回的演說，喚醒了德民的精神，奠定了德國復興之基。

非氏目擊祖國之危殆，民族之頹唐，認為欲使德國由死亡深淵再事崛起，非喚起民衆的自覺，復興

民族精神下事，所以他十四回的大演講，其主旨即在說明德國之所以敗亡，乃全國上下自私自利，達於極點

之結果，非法軍之罪，實咎由自取。吾人欲使再生，必須檢點。己的過失，實行內心的大改造。第一要

養成精神眼。他說：吾人肉眼每看點滴污穢，雖與自身痛癢無涉，然視之內心即感到不適。精神眼亦

然，讓人民見國家之受辱，人民之麻木，如有此精神臨時，則如針砭在背，有勢必除毒癰以安腹之決心。此種精神如養成，則能辨別善惡，克盡職守。

其次他主張提高民族之自信心。即發揚光大過去歷史中之偉績，使德人知德民族為一優秀民族，具有復興能力，決不為他族所屈服。並實行這兩種方法，唯有實行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新教育制度，在國中學沈淪到這般墮落的國恥，如倘有自救之舉時，則只有依據過去健全來用過則重新手段。造成全新的事物組織，始為可能。

「一言以蔽之，惟有變更從前的教育方法，實係余所提議以挽救德國民生存之唯一手段」。前面已經說過，當時的柏林，仍在法軍的手中，故菲氏演講之得以成功，實為一奇蹟。當時有一書店主人，因發行了「奇辱中之德國」一書，被處死刑。故菲氏之不死，乃意外事。然菲氏處之泰然，在他當時的日記中曾有下列數語：

「余之所求者無他，德意志人之奮發圖強而已。設余因演講而死，則余兒子余家族乃得一殉國之人以為父，實乃無上之光榮。凡世之歸德如此，可謂大得其所」。

可見其決心如何。此證證明德意志偉大人格，深重堅決思想之人的最後態度。由於他的十四次七數萬言的演講，到處燃起了德意志民族的要國心火，全德意志的復興運動，實由一哲學家的努力。

這一段由於發揚民族精神而獲得了民族已失掉的自信心，恢復了民族精神。挽救了亡國慘禍的奧

實效。非民演至今僅及百年，而今之德人，仍前無上。或謂：「世世各國，亦均付其民為民族復興者，曰：『德人之精神，為民族復興之良藥。』」

我們現在心裏，當時的德國，與我們現今相似。或懷德人，感德人之精神，乃五法德和約簽字以後，所稱之德人，當時的德人，已外其民之精神，而回，然卒能掀起全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不數年，途有德人之德，感德其德，亦何如。故今日研究中華民族精神，相與德人，感德其德，亦何如。始能抗強敵，一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這是研究民族精神，和德人，感德其德，亦何如。前日，當德人精神，當德人精神，當德人精神，當德人精神。

一、五法 現階段的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

前事而論，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中華民族之道德，也即是精神，這些道德與精神，支持了五千年來之中華民族。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每個中國人心裏之德。五千餘年，我們祖先所遺留下之唯一遺產。繼與船來品不同。然而有此種之美德，我們為何現在受到種種奇辱之遭遇呢？一言以蔽之，曰：由於現階段的國人，喪失了這種美德。精神總動員中，救國之道德一節，內有下列數語：

此節中，中國之需要，為振興起敬。據寇患以救國家，故今日所需於吾國全體力求實踐之同一道德，敬為救國之道德。而此救國之道德，實為吾民所固有，亦即 總理所倡導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

德。國民對此八德，認識或有深淺，但中國民族昔日之綿延光大，實賴有此道德，今日之衰弱式微，實由喪此道德，故非要求吾國民一致確立此救國道德不可。正道破了目前國難的原因。故今日之遭遇，猶如百年前之德人，實由自取。百餘年來，我們民族遭受了接二連三的艱難。鴉片戰爭之後，繼之甲午之役，拳匪之役後又繼以五九國恥，青島戰役，濟南慘案等相繼而來。並不因時代之轉入民國而外侮稍減，甚更變本加厲，終至演成此空前民族的大慘狀。全國國民，雖於每個國恥，均置以紀念自以示不忘，然每多事過境遷，安之若素，又復返昔日之麻木狀態。一般知識份子，口頭上雖高唱雪恥復仇，然其所做所為，頗少與其言論相符，即純潔之青年學子，一入社會，即忘却其昔日之抱負，仍表現其爲十足的中國人。陳獨秀先生有言：中華民族之骨片如於顯微鏡下窺之，均有「陞官發財」四大字。其言雖苛，然實現階段中華民族劣點的總暴露。非希德於其講述德國衰亡原因時，他說以此懦弱與麻木之語，已足道彼德國敗亡原因之全部。孰知我們的劣點又多於此呢？

然則，吾中華民族其將一蹶不振乎？曰是絕不然。蓋吾中華民族之道德精神，爲五千年來我先民先祖與生存奮鬥所得之美德，故凡爲中華民國，其血液中之實富有之，只要加以提倡獎勵刺激，仍復有再生之希望。中華民族之道德精神，乃中華民族所共有，非智識份子或某一部份子所壟斷佔，故只要某一部份子仍能保持此美德而無失，則如藉此人等，由此人等與以發揮光大鼓勵提倡，勢現如燎原之火，先由某一部燃起，而蔓延至全國每個角落。現階級民族道德精神之所以式微，在智識份子言之，縱索實

爲外來思想所蒙蔽，爲本國劣點所麻痺，並非完全喪失，至無智識之勞苦民衆，他們之民族道德精神，原無智識份子之缺陷，所可惜者只是缺乏提倡引導而陷於認識不足耳。故由此點看出，現階段之中國大部勞農份子，其民族道德與精神，實較知識份子所存者爲多。他們既未受西洋文明之皮毛所毒浸，幸亦未被國內已受其毒之亡國教育利己主義教育所薰染，故其血液中劣德少而美德多。抗戰以來，由於中華民族精神道德之無限高揚，已改變了世界人對中華民族的估價，而其前仆後繼，百折不撓者究爲何人？他們既不懂得喊叫團結，亦不懂唱什麼是統一陣線，然其每見自己祖宗所遺留之土地田園被敵人蹂躪荒蕪，自己的兄弟姊妹同胞被敵人戮殺姦淫，便毅然油然於其血液之中，不知不覺的被此非常刺激所感動，而發爲無上的國魂。請看兩年來各戰場之悲壯驚人的英勇史略即知，而演此史劇的主人翁，却多半是素朴天真的老百姓。

關於抗戰期間，唱高調的仍舊是唱高調，在前方效命的既是老百姓，而在後方無言無語既出錢又出力唯命是從一心支持抗戰的，仍是老百姓的例子太多了。驅場効命乃民族道德的忠孝所表現，至於仁愛方面，知識份子也是落在老百姓的後邊。他們說老百姓爲愚人爲無文化者，所以他們對於大眾的甘苦是不關心的。請看街頭吃食者每日所僅索得的幾枚銅元，幾塊殘飯，都是何人所與？無疑的還是老百姓——貧苦大眾。惟有他們才知道飢寒之苦！既不能效命戰場，又不任後方幫助生產，還不能替政府組織民衆教導民衆。請看他們的生活就知道了。第一是逃亡，第二是逃亡，第三還是逃亡。從上海逃到重

麼，不知道想邁往何方！

以上對於現階段中華民族的道德精神的狀況，無情的勇敢的與以分析了。所以假定今日吾人認為中華民族的道德精神必須提倡發揚確立統一的話，筆者以為第一應先從大部份的知識份子着手。他們學會了一知半解的西洋知識，抹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優點，矛盾的自身即浸染於劣德的勢力圈中。所以必須打破他們的謬見和頑夢，使他們從萬仞的深淵，重返於自家的祖國田園，來對祖先遺產與以重新評價。

四 如何發揚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

以上已將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之為何物，與為何必須研究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以及現階段的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的分析三點，大略已與一概括的敘述，現在，吾人再進而討論如何去發揚，應根據如何步驟去施行等事。

吾人由德國的歷史教訓當能充分了悟，即假若一民族有其缺點，而此缺點適足以致亡時，則若不將此種缺點與以澈底的檢查，然後再將其加以改造或剷除，則想要發揮光大固有道德，高揚民族精神時，恐怕要難免事倍功半之弊。所以如欲發揚民族精神，則必須先來個過失的總檢查和內心的大改造。關於此點，此次頒布之精神總動員中，闡明最詳，吾人如能遵行，當能收效。然既由此五項精神之改造觀之，可知即一領袖自身恐亦感到知識份子之對於精神總動員之必要或更甚於一般民眾。例如（一）醉生

夢死之生活必須改正一項，請看今日某一部份人的生活是醉生夢死？醉生夢死的生活就是腐化的生活。

一般民衆他們爲衣食所迫，是不能醉生夢死的。(一)奮發蓬勃之戰氣必須養成，反言之即不要頹唐不

要墮落，此點一般民衆爲衣食所迫，也是比較有憐憫的。(二)苟且偷生的劣性必須革除，此爲全中國民

族的劣根性，然處爭之世，敵人壓境田園被侵，一般民衆大勢已有強欲苟且偷生而不能之概，何況他們

逃避兵役政府還可以繩之以法呢？至於知識份子就不行了。他們在離砲火很遠後方，還不須去服兵役，

所以這(三)項主要也還須知識份子多多努力。(四)自私自利的企圖必須打破，陞官發財爲中華民族

所最愛慕的，然而想陞官發財須有機會與條件，此點也是一般民衆可能性很少，自私自利過於極點可以

認賊作父出賣祖國，然老百姓想發財而做漢奸，充其量也只是小漢奸，影響於民族利益尙小，但知識

份子之自私心如到達極點，而當漢奸，則本領就大了。所以他影響於全民族之安危也就大了。請看南北

僞組織的頭號漢奸都是在過去自命爲某一部份的人！如果羣身列最高國策會議，爲一己之私榮而將此呈

獻敵人，此豈是萬惡凶極之舉人，中華民族的最大恥辱。然則，這又何嘗是老百姓的自私自利所能比！

(五)糾纏錯雜的思想必須糾正，也多半是培植知識份子而言，至於一般民衆，他們只有一個思想，就是

他們中國人，所以各種主義派別，是與他們無關，最低他們是不會有違背三民主義的行動。

由此看來，知識份子實在太大了。知識份子太對不起民族真國家了！凡爲知識份子宜如何自

勉，來參加建國的建國大業呢！

不過，自己的缺點糾正得太多，沉淪到如此地步的中國民族，或有因此反而喪失了他們的自尊心的危險。所以在此發揚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才爲絕對的必要。關於發揚民族道德的材料太多了，最主要的是在宣傳者的態度問題。口裏講的是應如何緊張努力參加抗戰，而一切行動馬馬虎虎隨便時，則倒不如不講。故在此亦應做菲氏的教育方法，即要用誠懇的態度，與過去不同的方法不可。內心空虛形態傷善的人，無論他講得天花亂墜，都是毫無效果的。

其次對於敵人的暴行，敵國的缺乏，亦應向民衆宣傳，以增大其敵愾心與自尊心，使民族覺悟，發展至最高度。

關於實際方面，精神總動員上已經說得很詳，所以牢記住上述三個原則，根據所指示的方法去實行即可。如能如此，則所要求的共同目標，將會不期然而自然的達到。

現在已不是講理論的時期，時間空間都不允許我們再因循敷衍下去，我們要用行動來代替高調。菲希德以一人之力，挽救了全德意志民族的危亡，難道我們上有政府的指導，下有愛國志士的倡和的民族復興運動，不能成功嗎？所以千言萬語最後一句話，主要的還是領導階級的身作則，躬行實踐。

本書審查證圖字第六三六號

266
5214

版權所有

民族道與民族精神

編輯者 民意週刊社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總經理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六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拔提書店
重慶武庫街八十三號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初版

實價二角四分

